

“美德有报”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建构

傅燕晖

内容提要: 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妻子与女儿》采用“美德有报”的故事框架,聚焦于“美德”与“回报”两大要素,但与传统模式不同,这部小说关注“美德”对女性产生的影响,揭示了女性“美德”与“婚姻”之间的“牵强”联系,在“婚姻”的回报之外,将“美德”作为更好的回报给予女主人公。盖斯凯尔借此对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女性角色设定与女性力量加以反思,在推崇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维多利亚社会主导话语中寻求女性自我建构的另一种可能。她回应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丧失个体身份的焦虑,以及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反叛的焦虑。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关怀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开始的女性解放运动精神相契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 盖斯凯尔 《妻子与女儿》 “美德有报” 自我牺牲 自我建构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8)05-0032-11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10.16430/j.cnki.fl.2018.05.004

Title: “Virtue Rewarded.” Victorian Women’s Self-Sacrifice and Self-Construction

Abstract: In *Wives and Daughters*, Victorian writer Elizabeth Gaskell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the “virtue rewarded” story that foregrounds female “virtue” and “reward.” However, the novel differs from the conventional storyline in that it focuses on the virtue’s impact upon women, destabil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eminine “virtue” and “marriage,” and rewards the heroine with “virtue” itself, as well as with “marriage.” In this way, Gaskell reconsiders the role and power of early Victorian women, and opens up a new possibility for women’s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Victorian discourse of self-sacrifice. In doing so, Gaskell addresses Victorian women’s anxiety about the loss of self-identity, and Victorian society’s anxiety over women’s rebellion. Gaskell’s feminist concern dovetails with that of British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starting at the 1870s, and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Elizabeth Gaskell, *Wives and Daughters*, “Virtue Rewarded,” self-sacrifice, self-construction

Author: Fu Yanhu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yhfum@163.com

“美德有报”的故事常见于英国 18、19 世纪的婚恋小说中,主导情节是有德(virtuous)的女主人公得到了回报,具化为婚姻形式的世俗回报。在英国小说史上,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1740)^①是“美德有报”故事的早期范例,奥斯丁(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和《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等明显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但是,对此模式,也有批评家提出质疑。美国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如此看待《曼斯菲尔德庄园》将女性“美德”与“婚姻”绑定的做法:“我们难以释怀的是,范妮·普莱斯(Fanny Price)的美德竟然为她赢得了美德之外的回报。帕梅拉的阴影笼罩在范妮的成功之路上”(186)。“美德”似乎既应该又不应该与世俗回报有所关联,赢得世俗回报的“美德”好像是可疑的。在文学批评史上,除了特里林,许多批评家也常以文学姐妹之名称呼帕梅拉与范妮。她们的姐妹不少,《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 1864—1866)中的莫莉·吉布森(Molly Gibson)也是其中的一员。《妻子与女儿》是维多利亚时代重要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美德有报”的故事,结局也是贤德的女主人公步入美满婚姻。但是,小说揭示了从女性“美德”发展到“婚姻”的漫长过程,弱化了“婚姻”作为回报的重要意义,超乎寻常执着地关注“美德”本身,并将“美德”作为更好的回报给予女主人公。这倒是更符合特里林对此类故事的期待。

盖斯凯尔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书写“美德有报”的故事却又偏离传统,缘由是她面对着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丧失自我身份的焦虑,以及维多利亚社会对潜在女性反叛的焦虑,这双重焦虑推动着她在写作中深入思索,寻求兼顾维多利亚社会与女性个体需求的出路。她在传统的小说情节模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表达方式——“美德有报”的范式。借助小说人物与传统人物的对话,故事情节与传统模式的偏离,盖斯凯尔在莫莉这个貌似传统的女性人物身上,写入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理想女性设定的反思以及对女性自我建构的设想,强烈地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关怀。“美德有报”的叙事看似使这部小说流于平常,使小说的女主人公变得“无趣”,但它在盖斯凯尔的笔下却成为一样有效的法宝,使得这部小说能与过去的传统对话,与未来的潮流联结,不随时间的流逝沦为了一座孤岛、荒岛。

“美德”

《妻子与女儿》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故事围绕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小镇上的医生吉布森家、乡绅哈姆利家与贵族卡莫纳家族三户人家的交往而展开,重点刻画莫莉·吉布森在行将步入成年时如何应对生活中的一系列变化,成长为德行兼备的女性。莫莉的母亲早逝,她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感情浓厚,但及至她长成大姑娘时,父亲迎娶了克莱尔·科派崔克(Clare Kapatrick)为妻。克莱尔曾在卡莫纳家当过家庭女教师,丧夫多年,育有一女辛西娅(Cynthia)。莫莉同时又新识了哈姆利一家。哈姆利太太(Mrs. Hamley)与她情同母女,哈姆利家的小儿子罗杰(Roger)更是待她亲如兄妹。莫莉的生活中虽无大事发生,考验却不少。她不大喜欢自私自利的克莱尔,但为父亲的幸福着想,却很忍耐。她喜欢罗

^① 在帕梅拉所处的时代,“贞洁”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故而标题中的“virtue”也译作“贞洁”。

杰,但见罗杰喜欢辛西娅,她虽难过,却一心想着如何促成好事。在哈姆利太太、哈姆利家长子奥斯本(Osborne)先后去世,哈姆利家失序之时,莫莉成为他们坚韧的支柱。莫莉的“价值”终于被发现,赢得了罗杰的爱。

这是一个“美德有报”的故事,情节不戏剧化,没有悬念迭起,也不浪漫,但故事的写实性、日常性却引来最热切的关注。19世纪60年代正是惊悚小说(sensation fiction)深受英国大众追捧的年代,戏剧性的情节是广大读者的期待。比起现代人,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者更明白这一点。他们公认《妻子与女儿》是盖斯凯尔艺术成就的巅峰之作,赞誉其与哥特小说、惊悚小说迥然有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点,将其清新气息、细节雕琢以及日常生活韵味比之于奥斯丁、爱略特(George Eliot)的写作(Easson 464-65, 468, 471, 474, 478-79)。维多利亚人乔利(Henry Chorley,此人也是作家)还写道:“这里没有精巧复杂的情节,女主人公也没有两个丈夫,她把其中一位推入井中,放火烧毁房子,销毁谋杀证据,故事里并没有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日常的故事,日常的人,日常的动机”(471)。乔利此时心中所想的显然是典型惊悚小说——布莱登(Mary Braddon)的《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 1862)中的情节构思。但盖斯凯尔讲述的不过是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以致有评论直言,“没有多少事情发生”(Pollard 225)。对此,盖斯凯尔的传记作者、知名传记作家葛瑞(Winifred Gérin)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盖斯凯尔在更大程度上接纳了日常经历,较少借助戏剧化情景推进情节,体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进步”(237)。盖斯凯尔的这一特点在《妻子与女儿》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它避开了彼时盛行的惊悚小说套路,选择了女性写实主义传统。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梳理女性写作传统时指出,从奥斯丁到爱略特,女性小说朝着无所不包的女性写实主义(female realism)方向发展,全方位地探索家庭与社区中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女性价值(29)。盖斯凯尔即是在这一传统之下写作。她取“妻子与女儿”为正标题,以“一个日常的故事”(“An Every-Day Story”)为副标题,目标指向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女性角色设定——女性是“相对的存在物”(relative creatures; Ellis, *Daughters of England* 123)。这一论断包含两层隐意:女性的生计有赖于男性;女性的生活围绕着男性而转动,家庭生活构成了她人生的全部意义。这是维多利亚社会女性角色设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盖斯凯尔试图从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女子的日常出发,对妻子与女儿的居家角色做一番全面的回顾与根本性的反思。这不可避免会有“无趣”的“情节”。詹姆斯(Henry James)特地为此做过辩护:这些“家庭生活细节看似微不足道,但盖斯凯尔可能把它们看作是在‘实现’她的‘中心思想’……这些细节也将培养读者对女主人公的兴趣”(464-65)。不但如此,这些细碎的情节还揭示了女性生活受限,没有机会像男性那样成就大业的不争事实。与此同时,它们也是为揭示莫莉的“美德”服务的。

盖斯凯尔的女性写实主义不仅体现在她描写女性生活的日常、挖掘其价值,还在于她对当时女性所面临的根本困境的清醒认识。因为有了清醒的认识,她在“美德有报”的故事中埋藏了不那么欢快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比起圆满的结局,它们更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小说倾力呈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富有同情心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人物,但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盖斯凯尔关注女性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倒不如说她担忧自我牺牲倾向的潜在危害,在本质上关注的是女性的自我(self)。

《妻子与女儿》的“美德有报”情节将女主人公的“美德”推至前景,使其成为小说聚焦所在。那么,维多利亚社会推崇的女性美德具体为何物?当代评论家韦尔什(Alexander Welsh)把英国文学中一些女性人物都纳入“爱与真”(love and truth)的传统之列:她们既执着地忘我奉献(爱),又忠于真相、忠于他人(真),远可追溯到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的尤娜(Una),近有狄更斯的艾格尼丝·维克菲尔德(Agnes Wickfield),莫莉·吉布森也位列其中(169-70)。不过,虽渊源甚深,女性的“爱与真”品性却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才受到推崇,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1837—1870)理想女性——“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主要美德。“家庭天使”的成形有赖于艾利斯(Sarah Stickney Ellis)等倡导者的推动。这些人继承了18世纪后半期福音派运动对女性的认知,发表了一系列女性行为指南书(conduct book),规范女性的义务责任,确立了理想女性意象的构成要素,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这一理想女性因帕特摩(Coventry Patmore)在1854至1862年间陆续发表的《家庭天使》组诗而得名“家庭天使”。她肩负着维护家庭与社会道德的大任,是高尚品德的化身,以自我牺牲精神为其精髓所在。《妻子与女儿》要应对的正是“家庭天使”挥之不去的影子。

作为“美德有报”故事的女主人公,毫无悬念地,莫莉选择了“爱”——牺牲自我。在罗杰的事情上,莫莉甚至有“献祭”自我的念想,小说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在看出罗杰的爱恋在别处之后,莫莉迅速转换角色,变成了充满同情心的“旁观者”,进而又全身心投入到为罗杰争取幸福的行动中。她下定决心:“需要的话,她愿意切掉自己的右手,替他赢得辛西娅的爱”(Gaskell 345)。在看出辛西娅配不上罗杰之后,她更决心要“帮她(辛西娅)改变想法,给予她建议,并在行动上帮助她”(464)。她对辛西娅说,“我加倍(doubly)爱你,因为他如此爱你,如此敬重你”(377)。莫莉不仅压抑爱意,甚而将自己对罗杰的爱升华为对辛西娅的关爱。这与奥斯丁的范妮对待情敌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奥斯丁笔下,范妮深爱埃德蒙(Edmund Bertram),对情敌玛丽·克劳福德(Mary Crawford)敌意颇深,但她努力保持“理智”“自制”(Austen 181-82),有所节制,适当退守,求得自保。可是,在莫莉身上,“自我牺牲”仿佛化为她的第二本性,这股精神在她体内恣意生长,有失控的危险。

莫莉完全遵从了以艾利斯为代表的维多利亚社会大力倡导的女性自我牺牲精神——视“默默地忍受苦难”为自己的最高职责(*Daughters of England* 73)、“把自身的存在融入到他人的存在之中”(Women of England 160)。可是,盖斯凯尔在此问题上不如艾利斯乐观,她时刻留意莫莉的变化,发现她变得“缄默”(117)、“安静”(126)。莫莉“安静”,因为是在默默地忍受。有一处,小说写道:莫莉的“自我牺牲为她快乐的危机(a happy crisis)增添了几分奇特的乐趣(a strange zest)”(345-46)。这句话有些拗口,“乐趣”的修饰语是“奇特”,表示令人不解,而用“快乐”修饰“危机”,修饰莫莉的兴奋心境,有殉道士的味道。莫莉意欲献祭自我,大有向死的趋向。她的“身体变得虚弱,心脏跳动更微弱,更缓慢了”(411)。莫莉发现辛西娅并不爱罗杰,她为罗杰焦心。与此同时,在家中,她看到克莱尔总爱编造小谎,希望父亲能主动纠正,但发觉父亲因此感到痛苦时,她又转而希望他不要看穿克莱尔。莫莉愁肠百结,心里塞满了他人的疾苦,最后病倒了。小说借克莱尔之口下了结论:莫莉“情感过于丰富,连她自己都难以承受”(582)。莫莉莫名其妙的病症呼应了哈姆利太太莫名其妙的过世。盖斯凯尔或许想说:忘我奉献、富有同情心的生活可能使居家女

性负重过度,长此以往,会有被一根稻草压倒的时候。

除却健康,莫莉“牺牲”的还有她当初害怕丧失的“个性”。盖斯凯尔对女性个性与自我的关注,始于自身的困惑。她在为人妻为人母,又凭写作成名,开始遭遇多重角色冲突的难题之时,曾如此审视自我,“我的身上有几个我(mes)……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我……另一个是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我……这是我的‘社会性自我’(social self)……还有一个我,能全心感受美,喜爱便利,自娱自乐”(Chapple and Pollard 108)。此处最后提及的“我”,频繁出现在盖斯凯尔的书信及作品中。推己及人,她更深切意识到女性身上除却无私品质的存在,还有另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我,而这个“我”的存在于女性又是何其重要。莫莉内心就有这样一个“我”,令她心生疑问:“更多地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的幸福着想也是可以的;但这难道不意味着放弃她的根本个性(her very individuality),浇熄所有热烈的情感、真实的欲望,而这些不正是她所以成其为自己的根本(her very self)所在?”(134)莫莉深刻认识到,这些热切的“情感”与“欲望”构成了她的“个性”,是生命的动力,是自我存在的根基。罗杰的劝导显然迎合了艾利斯等人所构建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主导话语。艾利斯在女性行为指南书《英国女儿》(*The Daughters of England*, 1843)中,强调女性具有敏感性情等禀赋,应善加利用,不应为现世而生,应为永生、为他人而生(6-8)。莫莉反驳道:“也许对于天使是那么一回事。但我们是我们……这是现在,不是将来,那是很久以后。我们不是天使,看到未来就能得安慰……”(136)。莫莉拒绝来世奖赏的慰藉,关心自我在今生中如何自处。莫莉在出场时的“自我意识”很是抢眼。

小说用人物之间的“对照法”揭示了莫莉个性的丧失。针对辛西娅与莫莉的关系,著名批评家巴特勒(Marilyn Butler)指出,盖斯凯尔并不在意“推动关系的发展”,只意在“对照她们的道德品格”(286)。巴特勒很期待莫莉与辛西娅能够互相影响,她对盖斯凯尔的“对照法”略有微词。但盖斯凯尔钟爱“对照”,她告诉我们,“莫莉总是温柔的,但很严肃、安静。辛西娅,相反地,总是很快乐,开口就是漂亮打趣的话,几乎不曾安静片刻”(344)。辛西娅曾对莫莉说,“不要对所有的事情都这么严肃认真(serious)”(407)。“严肃认真”成了莫莉最显著的标签。而辛西娅呢?享乐至上、趋乐避苦、有功利主义倾向的辛西娅简直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与亨利·克劳福德姐弟的表亲。这对姐弟活泼有趣,也有良善慷慨的一面,唯独缺乏坚如磐石的道德品质。辛西娅也正是缺少了这份严肃性和坚固性。特里林指出,奥斯丁如此刻画这对姐弟,或许是意识到了“原则”(principle)与“个性”(personality)难以兼容(194)。盖斯凯尔设置两个对比强烈的人物角色,是否她也意识到了“道德原则”与“个性”的不可兼容性?意识到一个人在接受道德责任束缚之后,必不可免会丧失部分个性?她是意识到了,因而才在此前让莫莉表达了对自身个性与自我消亡的担忧,而后又仔细观察莫莉的变化。莫莉明显丧失了原有的生机活力,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一个缺乏生气的人。

事实上,维多利亚社会对男女两性都提出了“自我牺牲”的要求,只是两者存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小说借“暗线”点明了这一点。在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中,维多利亚人深切感受到了自我欲望的危害,对个人的自我伸张满怀恐惧,因而推重“克己”(self-denial)精神。不过,维多利亚社会的“克己”于男性更多指“自助、勤劳工作和独立自强”等“积极”品质,于女性则意味着“耐心、听天由命和默默地忍受苦难”等“被动”美德(Dyhouse 175)。

小说由罗杰为莫莉引入自我牺牲话语,越发映衬出两性的迥异处境。罗杰的成长是小说的“暗线”,与莫莉的成长平行发展。罗杰告诉莫莉,克己也是他努力践行的准则,但这意味着他在剑桥勤奋求学、开创事业、达成自我实现,莫莉却不然,她能做的不过是在家庭生活中默默承受一切。艾利斯认定这才是女人的存在方式,因为爱是女人的全部,是她的“财富”“权力”“存在之根本”,男人尽管也有爱,但他们在情感之外还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屹立于世,他们有着世俗的追求和抱负,但“女人全部的生活都围绕着情感转动,在那里她活着,否则她便失去了生命”(Ellis, *Daughters of England* 176)。然而,极力推行自我牺牲精神于居家女性的危害日益突显。盖斯凯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可是,盖斯凯尔也并未为莫莉创造工作的可能性,于绝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像男性那样拥有严肃的事业追求仍是遥不可及的想望。当然,盖斯凯尔在书信中也主张,如若没有家庭责任亟待履行,单身女性是可以外出工作的(Chapple and Pollard 117)。但她在小说中强调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于维系家庭存在、于维多利亚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莫莉的自我意识没有将她引向克莱尔与辛西娅的自私之路,也没有引她投身到社会的广阔世界里。莫莉的命运是:她将嫁与罗杰为妻,成为哈姆利庄园的女主人。

然而,虽然故事以莫莉的美德被发现、得回报的圆满结局收尾,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倒是,从女性“美德”到“婚姻”之间缓慢而困难的进展。我们难以忘记,莫莉的“好”是到了最后一刻才被罗杰发现的。小说第54章以“莫莉的价值被发现”为题,表明盖斯凯尔意识到了女性美德难以被发现。之所以不易受到赏识,也因它固有的时代特点。著名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曾一言蔽之: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比古典“美德”更“居家”(domesticated),比基督教“美德”更世俗化(secular; 12)。如副标题所示,这部小说讲的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日常美德,它不带有英雄般的耀眼光芒,它居家、世俗化。依据艾利斯对女性美德的定义,莫莉的美德属于虽不耀眼却十分重要的女性美德——“安静的、不耀眼的美德……这种美德更可能被感觉到,而不是被看到”(Women of England 157)。正因如此,哈姆利太太在莫莉踏进她家的那一刻就断言,她和哈姆利先生喜欢她,是因为他们“明白她真正的好”,但儿子们此时看到的多是年轻女子的外在——“衣饰得体、举止优雅”等等(79)。在此意义上,辛西娅显然比莫莉更有吸引力,也有更多的结婚机会。

为了促成“莫莉的价值被发现”,盖斯凯尔费尽了笔墨。学者保洛(Arthur Pollard)指出,莫莉的“创造者”对她的态度,“展现了盖斯凯尔夫人最具魅力的品质——同情心”(256)。小说的叙述者确实对莫莉倾尽母爱般的关注,扮演起了莫莉生活中一直缺失的母亲角色,关注她作出的牺牲,引导读者辨识莫莉的优点,了解莫莉的品行。小说继而揭示了另一层隐意:莫莉的美德虽十分重要,却不耀眼,要被“感觉到”,既费时且需要敏锐的洞察。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罗杰向莫莉的父亲解释他缘何在被辛西娅抛弃时,爱上了莫莉,理由是此时他看到莫莉眼里流露的同情,才意识到许久以来自己是多么“眼瞎”(642)。罗杰的解释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小说也不再多费笔墨、再做解释了。罗杰的这份间接“告白”,发生在莫莉大病痊愈(险些没命)之时。小说此时收敛节制的描写,并不十分可信的解释,莫莉长久的等待以及此间种种辛苦付出都冲淡了美满结局应有的喜庆气氛。在漫长的付出与等待之后,莫莉才被罗杰发现,这件事甚至还有点中彩的意味。我们不免想到:世

人多“眼瞎”者，谦卑隐忍的女子未必就能获得男性的赏识，莫莉们很可能只落得个老姑娘的命运。女子是否凭借美德就能赢得理想的爱情与婚姻？小说给出的答案并没那么乐观。“婚姻”作为女子美德的回报的重要意义随之被淡化了。

同样是“美德有报”的故事，《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写到埃德蒙发现自己爱上范妮之时，小说洋溢着欣喜之情，着实为范妮赢得的幸福感到欢欣雀跃，《妻子与女儿》却不然，它并没有放开手笔去庆祝莫莉的幸福。相较之下，小说一直以来更关心的是莫莉对美德本身的执着，这倒是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莫莉的执着程度明显胜出范妮几分，这或许是因为莫莉所代表的19世纪60年代女性的诉求已发生了变化。

“回报”

在19世纪60年代，盖斯凯尔选择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莫莉作为女主人公，并不是随意为之，与此时的社会焦虑不无关系。当代人信手拈来的自我意识，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却是一样稀罕物件。自我牺牲的美德自古有之。但是，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社会对个人道德建设的重视无以复加，对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崇尚伴随着对女性自我的约束日渐走到了极致，女性对自我身份丧失的焦虑也随之萌生。虽然绝大多数女性仍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从60年代开始，颇具自我意识、致力于自我实现（不以婚姻为实现方式）、争取教育工作权利的新女性（the New Woman）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英国文坛也及时做出回应，质疑与挑战女性的家庭角色。这一时期兴盛的惊悚小说时常探讨的主题之一就是女性身份丧失的焦虑。惊悚小说代表作《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 1859—1860）揭示已婚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在法律上形同不存在的事实。在另一部代表作《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维多利亚人憧憬的甜美家庭却充斥着罪恶，“家庭天使”不愿再百依百顺，对家庭责任心怀不满甚至憎恨至极，卷入了通奸、谋杀，给家庭造成致命威胁。不过，这类小说着力展现的更多是女性在情欲方面的自我表达与伸张，揭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秘密——“秘密是女人对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角色的厌恶”（Showalter 158）。对“家庭天使”顶礼膜拜的人如临大敌，担忧颇为自我的女性会摧毁社会的存在根基，反复巩固基本的理念。在他们的观念里，女性养儿育女、操持家事、奉献自我、维护家庭的道德水准、着力营造一个甜美的家园，是为正业。艾利斯是早期主要倡导者之一。罗斯金（John Ruskin）1864年底在盖斯凯尔居住的曼彻斯特市市政厅做题为《皇后的花园》（“The Queen's Garden”）演讲，于1865年发表此文，也意在巩固“家庭天使”意象的统治地位。19世纪60年代是“家庭天使”与新女性话语交织的年代。盖斯凯尔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塑造一个又是抗争又是努力，总算才争得了学习法语与绘画权利的莫莉，或许意以向父亲争取受教育机会的莫莉比拟19世纪60年代的新式女性（虽然莫莉与她们仍有差距）。盖斯凯尔一向密切关注时代思想动态，凭着“妻子与女儿”们的故事，参与到了这场女性问题的大讨论中。

盖斯凯尔对莫莉的“自我”可谓关心备至。她赋予了莫莉理想体贴的伴侣罗杰，赋予了他有别于许多文学男性角色的“特质”——作为科学家的他既支持莫莉培养科学爱好又能时常对莫莉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她更用心准备了另一样“回报”。她有意识地对“美德”善加利用，关注莫莉的道德自我建设，使其成为一个道德主体，对抗自我消亡的威胁。

前文提到莫莉还有另一样美德：“爱”与“真”中的“真”。“truthfulness”一词在19世纪的语境里有着“忠贞”与“言行一致”（诚实）的双重含义（Welsh 167）。莫莉的忠贞已无须赘言，而她对“诚实”表现出了十二分的执着，甚而有过度之嫌。辛西娅请求莫莉不要那么“诚实”，贵族小姐哈丽叶特（Harriet）称莫莉简直就是“真理”（truth；526）。因为“诚实”，眼见继母不时有欺瞒举动，莫莉不止一次思量：听之任之，是否正确？莫莉纠结质疑之频繁甚至“让自己很不舒服”（362）。因为“诚实”，莫莉也不喜卷入他人的秘密之中，无意中听闻奥斯本的秘密，她不觉有趣，只感到为难。莫莉奉行诚实原则。

盖斯凯尔似乎很认可莫莉对“诚实”的坚持，《妻子与女儿》在这一点上或许有所针对。18、19世纪的英国社会致力于培育女子的“谦卑”（modesty）美德，要求女性谦逊恭敬、谨言慎行。身处附属地位的女性相应也发明了“伪谦卑”（false modesty）的应对方式，女性的“坦诚”“诚实”因而时常受到怀疑。评论家坦纳（Tony Tanner）就曾为范妮的“谦卑”（缄默）正名，指出范妮的“安静”（stillness, quietness）和“天然的羞怯”绝不是“伪谦卑”，是灵魂真正的“不张扬的缄默”（unassertive reticence），是一种“无我”（selflessness）状态（156）。探讨这一时期的女性美德，“谦卑”显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女权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辩护》（1792）中重点抨击的现象之一就是英国社会推重所谓的女性“美德”（尤指谦卑、贞洁等），致使“伪谦卑”的形成，它牺牲了女性的“诚实”与“真诚”，迫使女性以功利为导向来培育美德（55）。克莱尔与辛西娅母女俩最显性的特征正是虚伪与欺瞒，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莫莉则“简单，诚实”（162），不似辛西娅懂得如何去“装”。莫莉的“诚实”甚至在社交时制造过唐突尴尬场面。盖斯凯尔本人就是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在维多利亚文学圈内有点小名气。她不会不知晓人际关系的复杂，为了礼貌周全，把握好诚实的尺度是件极复杂微妙的事，她为何还赞赏莫莉近乎过分的“诚实”？“诚实”对于当时的女性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探讨女性美德议题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相当看重女人的“诚实”美德，指出“诚实”（truth）才是真正值得女性追求的美德，她呼吁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机会与经济收入，摆脱附属地位，摆脱带有性别标识的伪美德，从改变女性自身仪态做起，培育坚实的美德（49，55）。盖斯凯尔未能如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得深刻，但她决然地把克莱尔与辛西娅放在莫莉的对立面，热忱赞美莫莉的“诚实”，或可解释为意与女性“伪美德”的历史决裂，塑造一个能够与男性一样，忠实于自我、保持自我的正直诚实与完整性（integrity）的女性。

除了给予莫莉一个“诚实”的自我，盖斯凯尔未让莫莉放弃的还有道德自由。莫莉愿意对克莱尔示好，却坚持自己的道德判断与正直的为人之道，并不事事依从克莱尔。她在道德领域的自我伸张愈演愈烈。为了辛西娅，莫莉被迫与普莱斯顿私下见面，不巧被镇上的人撞上，误以为两人有隐情，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这在当时不是小事，清白名誉几乎是一个女子最重要的财富。吉布森听闻此事，对莫莉大发脾气，想替她澄清污名。莫莉的态度却强硬得很：“但是，我也不觉得我能做什么了，爸爸。也许我做得很笨拙；但是我做了，是我自己选择去做的。并不是别人的建议。我也很肯定，如果有错，不是道德上出了错，可能错在判断。正如我说的，现在都结束了；我所做的，是了结了这件事。如果大家还是要对我指指点点，我也只能认了；你也是，亲爱的爸爸”（518）。此处，“我”字出现相当多次，突显了莫莉的自我意志。有学者主张，莫莉与哈丽叶特小姐一样都对“独立”情有独钟

(Colby 100)。事实上,两人所拥有的独立与自由天壤有别。小说清楚地表明,对于出身职业阶层家庭又连受教育机会也受限的莫莉来说,要赢得贵族出身的哈丽叶特小姐的经济独立与自由是难上加难的,但道德自由尚是她有望争取的。在道德自由问题上,盖斯凯尔看得更深刻全面的还在于:女性的“自由”权利天生携带着“责任”。盖斯凯尔使莫莉认识到权利与责任互为捆绑,索要自我的权利,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积极担当——“她选择承担自由意志的后果,并要求父亲允许她一人承担”(521)。奥斯丁笔下同样努力争取道德自由的范妮,并没有这般清楚她对自身负有的责任。

盖斯凯尔构建莫莉的道德世界,别有“用心”。她清晰地揭示,奉行自我牺牲精神、坚持正确的道德原则之后,女性内心会催生“道德优越感”,催生道德勇气,这有助于培育勇于担当、可靠的坚实自我,能够对自身负责。缘由何在?有如莫莉所言,她在“施行美德”之后具有了能“给予自我肯定的良心”(approving conscience; 534)。虽只是这么一句,却画龙点睛,指明莫莉的勇气源自何处,以及她的道德自我如何日益强大。盖斯凯尔一直持续关注女性的“道德优越感”,对其潜在害处心怀警惕。她在《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 1854—1855)中曾指出道德优越感可能会使女性心生傲气,妨碍她与他人的交流,而在《妻子与女儿》中她更关心女性如何善用“道德优越感”或“给予自我肯定的良心”。“给予自我肯定的良心”、将“美德”作为女性的立身之本并不始自维多利亚时代,在范妮们身上也不时可见,使得她们能够有勇气与周围堕落的行为思想抗争。但是,在莫莉的时代,自我牺牲的话语已至鼎盛,女性的自我备受抑制,道德上的自我肯定愈发重要,可以成为女性精神力量的源泉,成为女性构建自我的坚实基础。盖斯凯尔最终将女性自我构建的重心放在女性道德生活(道德自我)的建设上。

盖斯凯尔的莫莉与奥斯丁的范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特里林敏锐指出,《曼斯菲尔庄园》(1814)与《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问世仅时隔一年,奥斯丁先是塑造了生气勃勃、活泼健康的伊丽莎白·班特纳,后转而刻画了不好动、病弱的范妮,人物性格迥异,根由在于范妮是隐忍的基督式人物(187-88)。坦纳承袭了特里林的观点,认为范妮的“静”源自默默地忍受苦难(suffer to be still; Tanner 157)。在此意义上,莫莉也从属于这一传统。女性的最高职责是常常“默默地忍受苦难”(to suffer, and be still; Ellis, *Daughters of England* 73),艾利斯如此劝导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这也是绝大多数维多利亚女性的命运。维多利亚女性致力于维护家庭与社会道德,任劳任怨、忘我牺牲的精神,一直存在于后世的女性角色定位中,延绵不断,在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遭受批判,一个世纪之后成为20世纪60年代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点批判所向。1963年,美国女权主义者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问世,猛烈抨击当时美国社会建构的“女性气质”话语,指出其塑造的“幸福家庭主妇”形象阻断了女性的正常成长,对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压迫(44-104)。而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样也遭到了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激烈批判,她在1967年出版的《疲惫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一书中,还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女人本身:“家庭永无休止地要求女人做出牺牲,并且乐于接受这种牺牲。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女人的这些牺牲,她们才成为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变成他们的包袱。”(转引自弗兰西斯·贡蒂埃 357)波伏瓦认为造就西方社会女性处境的三大因素是社会、丈夫以及女性自身的顺

从,而女性的自我牺牲就是女性顺从的一种体现,它是造就女性命运的祸首之一。在波伏瓦此书出版的一百年前左右,盖斯凯尔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赞誉女性的自我牺牲,或许显得保守。

但是,盖斯凯尔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做了种种努力。面对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束缚之间的矛盾,盖斯凯尔借用“美德有报”的故事,为居家女性寻求社会的认可,给予女性美满的婚姻回报。不过,盖斯凯尔在故事中更突出的是,莫莉的“美德”费时许久才为她赢得了意中人的爱情,而这“美德”还险些使她丧命。盖斯凯尔尽管意识到了这样的后果,却并未主张更激进的手段,仍然提倡女性的自我牺牲,但同时在当时社会的主导话语中积极探求出路,探寻女性力量的源泉。维多利亚社会主导话语对女性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也赋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道德优越性,盖斯凯尔尝试在道德领域为女性自我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她传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女性可将其忘我奉献和对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坚持逐渐内化为一股精神力量,成为自我建构的坚实支柱,这是对女性美德的更好回报。

后来的英国历史也证明,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开始的女性解放运动中,英国女性索要正当的权利,走出家门,服务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主要动力之一即是女性在精神上的自立,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默默地忍受苦难”之后发掘的巨大力量源泉。在此意义上,透过莫莉这个“严肃认真”的角色,我们当代人仿佛也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束缚之中寻得力量,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历程。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这股力量。□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usten, Jane. *Mansfield Park: Authoritative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Ed. Claudia L. Johnson. New York: Norton, 1998.
- Butler, Marilyn. "The Uniqueness of Cynthia Kirpatrick: Elizabeth Gaskell's *Wives and Daughters* and Maria Edgeworth's *Helen*."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S 23.91 (1972): 278-90.
- Chapple, J. A. V., and Arthur Pollard, eds.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67.
- Chorley, Henry Fothergill. "An Unsigned Review of *Wives and Daughters*." Easson 471-73.
- Colby, Robin B. "*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 *Women and Vocation in the Fiction of Elizabeth Gaskell*. Westport: Greenwood, 1995.
- Dickens, Charles. *David Copperfield*. Ware: Wordsworth, 2000.
- Dyhouse, Carol. "The Role of Women: From Self-Sacrifice to Self-Awareness." *The Victorians: 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 Laurence Lerner. London: Methuen, 1982. 174-92.
- Easson, Angus, ed. *Elizabeth Gaskell: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1.
- Ellis, Sarah Stickney. *The Daughters of England: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Character and Responsibilities*. New York: Appleton, 1843.
- . *The Women of England: Their Social Duties and Domestic Habits*. New York: Appleton, 1839.
-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2001.
- Gaskell, Elizabeth. *Wives and Daught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6.
- Gérin, Winifred. *Elizabeth Gaskell: A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P, 1976.
- Himmelfarb, Gertrude.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New York: Knopf, 1995.
- James, Henry. "An Unsigned Review of *Wives and Daughters*." Easson 463-65.

- Pollard, Arthur. *Mrs. Gaskell: Novelist and Biographer*. Cambridge: Harvard UP, 1967.
- Tanner, Tony. *Jane Auste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 Trilling, Lionel. *The Opposing Self: Nine Essays in Criticism*. New York: Harcourt, 1955.
- 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7.
- Welsh, Alexander. *The City of Dicken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1999.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Ed. Deidre Shauna Lynch. New York: Norton, 2009.
- 弗兰西斯·贡蒂埃:《西蒙娜·德·波伏瓦传》,全小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Francis, Claude, and Fernande Gontier. *Simone de Beauvoir: A Life, A Love Story*. Trans. Quan Xiaohu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0.]

责任编辑:黄晓晨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